

《“高陶事件”始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陶事件”始末》

13位ISBN编号：9787216037426

10位ISBN编号：7216037421

出版时间：2003-9

出版社：

作者：

页数：4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高陶事件”始末》

内容概要

“高陶事件”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1938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了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他们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也给还留在抗战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以深刻的警示——求和之路，就是死路！本书作者陶恒生系陶希圣之子。在书中力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与自己的亲身见闻结合起来，将整个“高陶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通过自己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描绘了抗战时期作者一家人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本书包括：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抗战初期的和平活动；汪精卫出走；上海谈判与高陶脱离；“汪日密约”之揭露；再看汪日谈判会议；香港两年；二次脱险等内容。

《“高陶事件”始末》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序四序五自序第1章 书生论政而犹是书生第2章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侵略行为 一 第一次大战前后的日本 二 几个与日本有关的国际组织 三 日本炮制的侵华事件第3章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一 “七七事变”爆发 二 “八一三”淞沪战争 三 我家逃离北平的经过第4章 抗战初期的和平活动 一 陶德曼调与近卫第一次声明 二 “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 三 董道宁访日探路 四 高宗武的和平活动 五 近卫第二次声明与“重光堂协议”第5章 汪精卫出走 一 “重光堂”的出走计划 二 近卫第三次声明与“艳电” 三 撤销务永除堂堂籍 四 近卫内阁总辞 五 河内刺杀行动 六 汪蒋恩怨三十年 七 意志薄弱铸成大错第6章 上海谈判与高陶脱离 一、陶希圣随汪去沪的几种臆测第7章 “汪日密约”之揭露第8章 再看汪日谈判会议第9章 香港两年第10章 二次脱险第11章 结语附录著者后记参考书文目录人名索引

《“高陶事件”始末》

精彩短评

- 1、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说的是汪精卫
- 2、继续汪伪政权史探寻
- 3、其实有些篇幅稍长了点，对比过新版，加了船津工作一节，还有高宗武回忆录出版一章
- 4、急于为家人辩白的色彩太浓。叙事极不客观。关键处含糊其辞。
- 5、民国的历史读物都很有趣，很厚但是不难读的书，之后会附读书笔记
- 6、该书的作者是陶希圣的儿子,美国的水泥工程专家。此书对汪精卫时代的高陶事件做了深入的探讨，里面不乏惊心动魄的细节。让我阅读到深夜仍不忍撒手。现在高宗武的深入虎穴在台湾也出版了，大陆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我电话问寻广西师大出版社，对方说还没有出版。奇怪的是，我在网络上看见了这本书的书号。我期待着高的回忆录。另外，范泓的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对高宗武和陶希圣都有介绍，诸位可以结合起来阅读。顺便说一句，范泓的书也写的很好。再顺便说，我最信赖的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

1、起这个名字的缘由，一方面因陶恒生在叙述“高陶事件始末”的时候，不时提起其父陶希圣以一介书生之理想和热情，希望以“和平解决”的方针以保中国千万人之性命，而后复国有望。另一方面则是想到了周一良先生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读来陶希圣与周一良倒也有些相似。周一良先生原是陈寅恪的得意弟子，也是学界公认的陈寅恪的接班人。可是之后，他投入“知识分子”改造的洪流之中，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口述文章，托人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周一良的请罪之言让人读来唏嘘不已。陶希圣先生也是怀着认为自己有益于国家民众的一腔热血和政治理想，最后却险些成了通敌叛国的汉奸。他对自己也是一番嘲弄：“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晚年对此事也是耿耿于怀，悔恨交加。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从来对汪精卫是否是汉奸的争论甚嚣尘上，对高宗武和陶希圣的突然转变的猜测也颇多，通过此书，我们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首先对汪精卫是否是汉奸，此书的立场非常明确，汪精卫就是个卖国汉奸。作者陶恒生在描述其父陶希圣心路历程的时候，笔端间有意无意地强调陶希圣的某种卖国行为是被汪精卫牵着走的。虽然陶希圣意识到汪精卫的行为不妥，有卖国之嫌，但出于读书人“知遇之恩当以死报”的性情，一直跟随着汪精卫。作者虽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不为亲者讳，力求秉公持正，但这番言辞是否为父洗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对于汪精卫其人，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评价的：汪精卫风度翩翩，感情丰富，口才便给，文笔优美，是个才子型的人物，却绝不适合搞政治。政治人物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细密的规划能力、敏锐的分析嗅觉和冷静应变的功夫。汪精卫在这方面似乎多所欠缺，甚至往往易于感情冲动，意气用事。试看他早年谋刺清廷重臣的一幕，他不听孙中山、胡汉民的劝阻一意孤行；勇气诚然十足，而其规划不慎则形同儿戏，事败几乎丧失性命。再看他后来与政敌之间的种种纠葛，其表现一是立场不够坚定，言论变化无常；二是遇到挫折就辞职出走，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1911年至1936年20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6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依据作者所言，汪精卫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弱点，空有一腔热血但是缺乏冷静和规划，遇事优柔寡断，办实事时稍有困难就退缩等等。陶希圣身上亦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序言中，陶先生的学生何兹全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正是因为他重感情，虽在后来与汪思想不同，但抹不开情面，仍去了上海。对于陶希圣随汪去沪有种种臆测，有“卧底说”、“叛国获利说”和“抗战前途悲观说”等等。其中“叛国获利”说最不能苟同。1930年代，陶希圣在学界和政界都春风得意，若他为一己之私，放弃在学政界已有的一片天地，而去铤而走险，以出卖国家换取不确定的利益，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对抗战前途悲观的说法，应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和“艺文研究会”。他们认为持续抗战是不切实际的，只会死伤更多，耗尽国力，对于当时甚嚣尘上之抗战言论为不负责任的“高调”，汪精卫亦发表了一番言论即：“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一群知识分子在这里谈论“和平运动”，探讨时政。唐德刚先生形容这些团体聚会之人是“臭味相投”，其态度可见一斑。虽然舆论对这些知识分子极为不屑，但我们理由相信他们只是以另一种政治主张希冀挽救中国，纵然结果不堪，其初衷当值得肯定。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1938年底“艳电”发表以后，关于汪精卫的去向问题，陶希圣屡屡与汪推心置腹，劝其不要赴日，提醒汪注意自己的政治形象，在两国仍在交战的今日，汪的赴日，一般国民会怎么看？他说现在情况下的访日，决不能与议和之后之访问相提并论，他提醒汪精卫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能忽视人们对自己的基本评价。陶希圣推心置腹的话完全无用，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赴日，同行的队伍里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没有陶希圣。说明此时陶希圣已经由汪的心腹到被边缘化。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

《“高陶事件”始末》

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们力劝汪兆铭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绝不继续谈判。但汪兆铭已经完全被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高、陶对汪兆铭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最终权衡再三,几经彷徨,二人逃离汪的控制,将其与日密约昭告天下。他也自此明白,除了抗战,别无退路。陶希圣的一生着实让人感慨,也许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名垂千古,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食货》治史方法的提倡他都可做开山之人。可是他从了政,以读书人的理想和抱负想要拯救国家,却走向了深渊,幸好迷途知返,不致骂名流传。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近世尤多。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高陶事件”始末》

章节试读

1、《“高陶事件”始末》的笔记-读史使人睿智

重读《“高陶事件”始末》，念念不忘者有三：一是唐德刚先生序；二是陶氏感谢杜月笙和万墨林侠义解救陶家；三是陶希圣先生《八十自述》。

1) 唐德刚序

八年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抗敌全师丧亡殆尽，精华国土，泰半沦陷，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全军的第一副统帅，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忽然背叛祖国，投向敌人，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与祖国对抗。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细查5000年国史，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可是想不到，汪氏叛国经年，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陶希圣二人，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秘密逃往香港，将汪日密约公布，使举世为之哗然，合族为之切齿。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如承认伪满独立，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亦史无前例。虽石敬瑭、张邦昌、秦桧之流，亦不愿为之也。...

俄日瓜分中国，制造第二波兰

但是朋友们，天下事也往往确有些非常人理智所能想象之处，那倒是绝对的民族危机呢。我们读戊戌变法史（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第三分册），知道那位可敬可爱的光绪小皇帝，在读过康有为给他的小书《波兰亡国恨》，而泪流满面。但是我们可曾想到，在我们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的祖国却很可能变成波兰第二？朋友，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历史小说上的故事吗？且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故事的来源，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有无可能？

在抗战初期，我国独立作战的最艰苦阶段，顾维钧先生以他在当时国际间最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曾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和国际外交官的鸡尾酒会。以他数十年刺探国际情报的经验，他知道在这些酒会的闲谈中，各国外交官和武官们，往往在无意之中，酒后吐真言，会泄漏各该国最机密的情报。在若干酒会中，他就故意找机会，去和苏联的大使们、武官们闲聊。某次一位苏联驻东欧某国的使节，听过顾氏对他叙说，中国抗日战争中，苏联提供中国的援助，超过所有其他援华国家的总和。因此，没有苏联这项无私的援助，中国可能就被日本征服了。所以中国军民，对斯大林元帅的恩情，真是感激不尽。

这位俄国外交官，听得飘飘然之后，不觉酒后吐真言：他说斯大林元帅，为着牵制日本，防其北进，他要不顾一切地援助中国抗战到底。但是中国如果抗日失败，连重庆也守不住了，或是汪蒋二人，抗日抗了一半，便向日本投降了，斯大林元帅的下一着棋，便是迅速与日本妥协。随之苏军将由蒙古新疆两地，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侵入中国，尽占中国西北、西南各省，与日本把中国一举瓜分，使中国变成“波兰第二”，云云。

顾公告我，他骤闻此言，直如冷水浇背。但他还是控制住，他作外交官的情绪，和那位俄国外交官，嘻嘻哈哈，欢乐地在酒会道别。“顾博士，”我说，“您可曾向重庆报告此事？”顾说，兹事体大，他还要从不同的外交管道，来加以“Confirm”（证实）。后来他果然从另一些苏联、东欧和土耳其，外交界的数十年的“老朋友”中，得到“证实”，这确是斯大林援华外交的底牌。

我还是逼问顾氏，“您告诉蒋委员长没有？”顾氏的表示是，蒋公那时是不会向日本屈膝的。重庆也不会失守。他认为此一情报，事机不密，可能会变成谣言。而寻根究底，这谣言出自中国驻法大使馆，那就不好了。他显然是秘而未宣，在不必要的时候，提供不必要的，最敏感的外交情报，原是不必

《“高陶事件”始末》

要的。但是我却劝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纪录下来。顾也同意了。我记得我是把和他说话的各国外交官和武官的姓名、时间和地点，都作了详细的录音。但是这些记录，在已发表的顾维钧回忆录中，可能都被当年删订人员，误认为是无稽之谈，或只为节省誊录和打字费用，给全部删掉了。顾公辞世后，这故事就死无对证了。

2) [陶希圣]年少时喜读史记及汉书的游侠传，最推崇西汉的游侠剧孟、郑当时两人；他在《侠士报国之义举 -- 为万墨林先生寿》文中：特别略说这两位大侠的行事：

汉初，洛阳人剧孟以侠著名于社会。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起。周亚夫为太尉，乘传车东行，至洛阳，见剧孟，大喜，说道：“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不能为。”当时，东南半壁反抗朝廷。首都长安之列侯从军，向商人贷款。商人以为关东战事成败未可知，不肯放钱。只有母盐氏出捐千金，贷予列侯，得以领兵参战。在这种艰困忧患的形势之下，大将军得一布衣，好像得到一个敌国，并以剧孟的向背，预测吴楚的成败。

景武时期，风格最高超的大侠是郑当时。郑当时初为太子舍人，每5日休假，在长安四郊置驿马，招待宾客，夜以继日，常恐不周。后为大司农，门下客至，无贵贱皆留，执宾主之礼。郑当时不置产业，招待宾客不过一盘菜饭。但是他向朝廷推荐才能，惟恐不及。他与宾客部属谈论，只要听见一句好话，必上达朝廷，惟恐其迟。自名公巨卿，至士子凡夫，无不称道郑庄。有一次，朝廷派他视察黄河缺口。他请假五天，以便整理行装。武帝说：“吾闻郑庄千里不奢粮，治行者何也？”由此可知郑当时在社会上交游之广阔，声望之崇高与影响之重大。

这就是祝寿词中‘球剧孟’、“慨郑庄”以喻杜月笙、万墨林两先生为当代游侠的寓意。父亲慨然于幼年在书本上所崇拜的游侠，竟在两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上出现。他继续写道：

幼年在书本上敬爱的人物，至中年竟在社会上获得实际的印证。西汉的贤豪竟复活于二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抗战期间，我一家人辗转南北东西，遭遇危难困苦。在日军占领区，及其他为政府权力所不到之处，杜月笙先生领导的恒社，无所不在。恒社友人在上海、广州湾、以及由九龙大浦、至沙鱼涌、惠阳等地，随时随地给我和我的家属以照顾与资助，使我们得以逃脱日本宪兵与所谓“76号”的禁制、追捕与迫害，而返国门，获自由。由此因缘，我得以知遇万墨林先生，从他所得的助力特多。

3) [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者，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自觉国家社会所许与我者，超过我应受与愿得之程度与范围。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年至八十，犹未及也。

推荐阅读：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高陶事件”始末》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